

「罷韓」的雙重政治意義

●陳奕齊／台灣基進主席

楔子

2018下半年，高雄吹起一股「韓流」，最後竟意外地讓台灣本土深綠的重要堡壘——高雄市市長——被親中的韓國瑜給奪下。早在，韓流聲勢崛起之刻，台灣基進便已經把韓流的主角韓國瑜在政治上定性為「親中+草包」這兩組概念。這是為何，參與2018年高雄市長市議員參選的台灣基進，便毫無懸念地站上「戰韓」第一線。

首先，「親中」的韓國瑜若當選，2020年初的大選，本土政權將岌岌可危，而在美中貿易戰所展開的國際政經的戰略拉扯下，2020年若由親中國國民黨當選，那麼台灣未來將形同站在美國川普政府嘗試拉出的「全球民主防中連線」中的對立面，而台灣等於是東亞第一島鏈的破口。再者，若巧舌如簧的「草包」韓國瑜當選，高雄過去二十年從輕重工業城市轉型的努力，將形同白費。

職是之故，縱使彼時高雄基層已形成一股「換人做做看」的韓流聲浪，若站在抵抗韓流的最前線，無異逆風，不利選情，但台灣基進的五位候選人依舊針對韓國瑜親中路線的危險，以及草包政見對城市治理的傷害，進行批判。果然，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之後的發展，除了未能預期到韓國瑜竟可在市長寶座尚未坐熱，便罔顧市民託付落跑參選總統之外，「韓流」的傷害性，的確如台灣基進當時的斷言一般。因此，罷免「親中草包」韓國瑜的運動背後，也就有著重新矯正「親中草包」所帶給台灣跟高雄市政治理傷害的重大意義。

「草包」勝出：政治再教育的必要性

事實上，「罷韓」首先對台灣社會具有一種「民主政治教育」的重大意義。在西方民主國家比較不注重「罷免」制度，此乃因民主社會的體現便是「定期改選」，而每一次的改選，其實也就產生「定期審核跟罷免」的意思。因此，民主制度的重點，會是在選拔政黨與優質有能的候選人。

但由於中國國民黨七十年的黨國殖民教育，以愚民跟牧民打造出方便統治的順民，在民主化之後，尚未能擺脫愚民與牧民黨國教育的選民，距離獨立思考、分析判斷的「自主公民」仍有大一段落差。黨國教育下的「牧民與愚民」文化殘餘，表現在期待

「民族救星」、「世界偉人」、「民主燈塔」這些英雄。當然，這種牧民跟愚民的文化殘餘，也展演成台灣政治場域中，選民墮落成某類追逐「政治明星」的狂熱粉絲而不以為意。這是為何，台灣政治討論並沒有隨著網路社群媒體的發達而更多元奔放，反倒壓抑了各種理性智識的政治討論之可能。端看，韓粉、柯粉或某類政治明星的粉絲行徑，都會令人對政治產生失望。

因此，罷免三個階段的高門檻：將近三萬份提案連署、將近三十萬份的二階連署、以及將近六十萬份的同意罷免票的難度，就成為一次「公民政治教育」。畢竟，罷免的每一階段都必須耗費相當大的人力與時間成本，相較於蓋印投票三秒鐘的輕易，在在表現出錯選之後的糾錯罷免之難度；正因為罷免糾錯之高門檻，不正向市民說明，選前沒有作好功課、人云亦云般的胡亂投票，糾錯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啊？！直轄市的市民竟然透由選票拔擢出「草包」，並導致市政崩壞，罷免高門檻與各項社會成本的消耗，也就成了一種公民政治教育的最佳演練課。

「親中」勝出：認同錯亂的再凝聚

由於中國國民黨的內戰史觀與中華民國黨國體制，導致台灣社會在民主化之後的政治競爭，常常會輕易演變成「認同」之爭。如果台灣社會內部身分與國家「認同錯亂」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一直讓「中國認同」的幽靈徘徊於台灣島內，那麼台灣政治將沒法進入到真正的「優質本土」的競爭模式，遑論利用不同本土政黨之間的不同「優質本土」的版本，慢慢讓台灣社會往新台灣共和的國家打造彼岸擺渡而去。直白而言，台灣政治長期無法健康與良性競爭，常常會害怕本土性、獨派更濃的小黨無法當選，唯恐親中政黨得利，因而導致投票行為受制扭曲。

過去，原本社會普遍認為，認同錯亂的問題將隨著有著歷史身世糾葛的「老兵逐步凋零」後，以及民主投票成為慣習之後，慢慢解決台灣認同錯亂的問題。詎料，中國改革開放之後，並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中共對內利用2008年的北京奧運，舉國拉抬中國民族自信，對外利用2007年美國次級房貸、2008年雷曼兄弟倒閉所捲惹起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一舉以「世界工廠」之姿，成為拉抬全球經濟復甦的主要引擎之一。

因此，馬英九在2008年復辟當選總統之後，開啟了台灣「門打開，沒顧厝」的兩岸市場與經濟一體化的政策，讓原本會逐步塵埃落定的「島內認同錯亂」問題，在一種「中國發展好棒棒」的「揚中貶台」的惡質宣傳中，再次被展演與拖緩。這是為何，中共紅色背後加持的韓草包，藉著「（台灣）貨出去（中國），（中國）人進來（台灣）」的「高雄發大財」，讓2016年中國國民黨大敗之後，理當已被揚棄的「親中拚經濟」路線再度復活。再者，長期由權貴資產階級所把持的中國國民黨的2016敗選，國民黨的「藍教徒」信心幾乎崩盤，但台灣島內紅色滲透的媒體與中共安置在台灣內部的大

外宣對本土全面執政治理的惡意詆毀，把早已信心全無與丟臉可恥存在的「藍教徒」，以「韓粉」跟「韓家軍」之姿，裝扮成庶民身分而重新喚回。

紅色韓流所召喚回的韓粉與韓家軍的「自信」是非常可怕的；畢竟，這種以「韓粉／韓家軍」為傲的心情，必須要被徹底擊垮，否則親中舔中的韓國瑜背後的「韓粉」等於向台灣社會宣告：「我親中，我驕傲」一般。因此，罷免韓國瑜運動的背後，所展示出的是除了是揚棄「親中與舔中」的政客之外，更重要的是，打擊韓粉們那種囂張氣焰背後將可能傳達給社會的「我親中，我驕傲」或「親中沒啥好可恥」的潛在暗示。是故，罷免韓國瑜的運動，便是徹底擊垮「韓粉」背後那種「親中也沒啥好可恥」的一種表現，這將有助於台灣認同錯亂問題得到矯正，並取得進一步的正常化的可能。

小結

過去伴隨台灣民主化的是，長期在黨國殖民統治下被壓抑的「台灣意識」的重新解放。對台灣意識的壓抑，表現在對「雙台」——台語與台獨等等的妖魔化與劣等化。對台灣意識的壓抑，其實就是台灣「認同錯亂」的文化基礎。是故，美中貿易戰之後，中國經濟嚴重下滑，再加上中國病毒武漢肺炎的意外爆發，進一步重擊中國的經濟，以及中國作為世界工廠的「紅色供應鏈」。因此，在中國經濟衰退與武漢肺炎疫情肆虐的背景之下，台灣民意基金會公布最新2月份的全國民調，在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爆發背景下，台灣人民族認同飆升到83.2%，是1991年以來的歷史新高點，同時中國與台灣併存的雙重認同比例只剩6.7%，較去年9月時大跌一半，來到三十年新低。此一民調結果，某種程度也是間接說明上述所指出的「中國發展好棒棒」的宣傳放送，的確有效地拖緩了台灣認同問題的底定時程。

簡言之，台灣「政治問題」的主要根源之一，乃在於「內外兩個中國」。內部中國帶給台灣政治的束縛是中華民國體制，以及過去黨國教育下的愚民與牧民性格殘餘。外部中國，則是接手島內原本的「內部中國」式微之後，對台灣意識與政治身分認同的打壓。再加上，許多島內政客的裡應外合，讓台灣政治受制於「內外兩個中國」的夾纏與夾擊。因此，把背景出身集「內外兩個中國」於一身的韓國瑜給罷免，也就意外地成了挑戰台灣政治問題根源——「內外兩個中國」的一種表現。

復次，「罷韓」運動的背景，恰好鑲嵌著美中國際政經戰略的對峙，以及武漢肺炎肆虐的當口，這將不會成為轉移「罷韓」熱度與視線的事件，而是剛好對應即將在春夏之交「罷韓」第三階段罷免投票的助燃劑。在此脈絡之下，罷韓，罷的其實並非只是「韓國瑜」市長本人，罷的是潛藏在市民思想身體之中的牧民與愚民慣習所表現出的黨國殘餘，以及台灣政客親中潮啊？！「罷韓」運動背後外溢的政治效果：讓台灣民主與本土雙深化的重大意義！◆